

国学基础文库

经传诸子语选

JINGZHUAN ZHUZI YUXUAN

张舜徽 纂辑 周国林 译注

国学基础文库

经传诸子语选

JINGZHUAN ZHUZI YUXUAN

张舜徽 纂辑 周国林 译注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传诸子语选/张舜徽纂辑;周国林译注.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
(国学基础文库)
ISBN 7-300-07594-0

- I . 经…
II . ①张…②周…
III . 哲学家—语录—中国—先秦时代
IV . B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5782 号



国学基础文库
经传诸子语选
张舜徽 纂辑
周国林 译注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 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		
网 址	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 (朗朗书房网) http://www.crup.com.cn (人大出版社网)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60 mm × 23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0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张	24 插页 2	印 次	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70 000	定 价	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学于古训乃有获

——《经传诸子语选》导读

当代著名历史学家、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(1911—1992),湖南沅江人。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、名誉会长,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、名誉所长,是全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。

张舜徽先生毕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,勤于著述,共发表论著二十多部,八百余万言。数量之高,并世学者中少有及之者。尤其值得称道的,是他在数十年的治学历程中,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。他精通“小学”,博治四部,成通人之学;他识见高超,继承前人成果而不囿于成说,勇于创新而不凿空立论。在文史哲诸领域,都留下了传世之作,如《周秦道论发微》、《说文解字约注》、《郑学丛著》、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、《清儒学记》、《中华人民通史》、《中国文献学》等专著,都是他以其卓识通怀精心结撰而成。发表后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,被誉为当代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师。

作为一位精通传统文化、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大学者,张舜徽先生认识到,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供人研究的化石、让人玩赏的古董,优秀的文化遗产应该成为当代人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。在他未刊的文稿中,就有这样一部以“进德修业”为宗旨而纂辑的《经传诸子语选》。整部《语选》的纂辑,始于他年轻之时。几十年间,他总是置之案头以备观省。到了晚年,“犹强起写定是书,亦欲用此为温故之简本,聊以自课云尔。”

一、情理交融的立身箴言

张舜徽先生纂辑《语选》,源于前人的选录之业。《自序》说:“载籍极博,非一人之力所能遍读尽记而皆不忘也,亦惟择其精要之语而记诵之

耳。于是善学之士，于群书多有节抄之本，而选精录要之业兴焉。”然而，以往从事选录之业者，“有文选，有诗选，独无语选，此亦书林缺典也”。因此，他早年读周秦诸子，便撮录善言，别抄成帙。其后，又推广至于六艺经传。对于经传诸子，他无轻重之分，因而有见之《十三经》而弃置不录者（如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等书），有不见于《十三经》而采录及之者（如《国语》、《大戴礼记》等书）。采录之书，时间从先秦至隋代，凡三十余部。张舜徽先生以为：“古人立言垂世，不外修己治人二者。修己，身内之事也；治人，身外之事也。”于是在定稿时，将选文分为内、外二编以区处之，以便于别其效用，不相混杂。

内编语选，涉及面相当广。概括为“修己”，却不仅仅是谈一个人的自身修养，而是从人生的角度来观照世情，讨论的是笃学、尚志、立业、规范、处世、自强、道义、言行、事理、交友、养身、治家之类的观念与方法。或许，用“讨论”二字显得太严肃了。在古人那里，他们是敞开心扉的倾吐，是披肝沥胆的交流，还有诉诸感性的表白。比如，《礼记·三年问》说到人间亲情，开头便讲：“凡生天地之间者，有血气之属必有知；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。”接着举鸟兽为例，“今是大鸟兽，则失丧其群匹，越月逾时焉，则必反巡。过其故乡，翔回焉，鸣号焉，踯躅焉，蹢躅焉，然后乃能去之。小者至于燕雀，犹有啁噍之顷焉，然后乃能去之”。意思是说，那些大的鸟兽啊，同伴死了一个月或一个季节，还难以忘怀，还返回曾经停留的地方，在那里飞翔，在那里哀叫，在那里徘徊。即使是小动物燕子麻雀，也要为同伴之死发出阵阵哀叫。结论是，鸟兽尚且如此，“有血气之属者，莫知于人，故人于其亲也，至死不穷”。这是讲道理，但很自然，一点也不抽象，没有板着面孔。讲亲情是鸟兽都做得到的事，何况人呢！

即使是抽象的道理，古人也往往从生活常识出发推导，三言两语，鞭辟入里。如《颜氏家训·名实篇》中的“余地”论就是如此：“人足所履，不过数寸。然而咫尺之途，必颠蹶于崖岸，拱把之梁，每沈溺于川谷者。何哉？为其傍无余地故也。”人在平地上行走，只几寸宽的地方就够了，而在崖岸和独木桥上，即使超过了几寸也往往会掉下去。这是很常见的事。

犹如当今熟练的汽车驾驶员，在平坦的大道上可以直线飞速行驶，占道总是中间的三四米。但如果只是三四米的道路，他们还能飞速行驶吗？这是因为，人和车都是需要保险系数的，心理上尤其如此。没有保险系数，“傍无余地”，就会“颠蹶”、“沈溺”。《名实篇》由远及近，由事及理：“君子之立已，抑亦如之。至诚之言，人未至信；至洁之行，物或致疑；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。”非常贴切，不由得人不产生共鸣。

更多的情况下，警悟世人的古语是不需要什么论证的，那是先哲生活中的智慧、社会历练中的总结，是千百年中文明演进的结晶。只要用心去体会，就会认同。翻开《语选》，这类话语便扑面而来。且以《伪古文尚书》为例。传世《古文尚书》之伪，早成定讞。然而所存诸伪篇中，格言名训，犹甚不少。张舜徽先生以为：“吾人如能降低时代去读，则目为出诸魏晋人手，而犹千数百年前古人遗言也。”不少遗言，足以垂训后世。《语选》内篇选了十五条，这里选录十条如下：

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。

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。

欲败度，纵败礼，以速戾于厥躬。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违。

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

惟天地万物父母，惟人万物之灵。

吉人为善，惟日不足；凶人为不善，亦惟日不足。

树德务滋，除恶务本。

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

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；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。

作德，心逸日休；作伪，心劳日拙。

以上十条中，有些是现代入耳熟能详，并奉为信条的，像“天作孽，犹可违”、“惟人万物之灵”之类。后面几条，人们则要生疏些，但其强调积德

行善的价值，远远超出今日的一些长篇大论。“玩物丧志”是大家都熟悉的，但有多少人知道它前面那句话呢？“玩人丧德”不是更耐人寻味、更发人深省吗？“丧志”只是影响到个人的进取，“丧德”却要伤害他人呀！“作德心逸日休”不难理解，何以“作伪心劳日拙”呢？原来，干诈伪之事者，是做贼心虚的，常常要用一个罪恶去掩盖另一个罪恶，甚至用大罪恶去掩盖小罪恶，在诈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，怎能不“心劳日拙”呢？所以，就有“吉人为善惟日不足，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”。对于君子而言，“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”，必须得“树德务滋，除恶务本”。这是历史一再检验的真理，不可不信从。不听古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

内编内容丰富，难以尽述，以下大致上按类别，每类各选一条，以见古人垂训之精到。

一是笃学。《国语·晋语九》中寥寥数语，道尽君子之学的价值：

人之有学也，犹木之有枝叶也。木有枝叶犹庇荫人，而况君子之学乎？

二是尚志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有一段名言：

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

三是立业。立业与志向有关，《荀子·劝学》谓：

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。

四是规范。规范多种多样，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传》中一段话，道尽“威仪”规范：

君子在位可畏，施舍可爱，进退可度，周旋可则，容止可观，作事可法，德行可象，声气可乐，动作有文，言语有章，以临其下，谓之有威仪也。

五是处世。《大戴礼记·曾子制言上》中一段话，阐明了人与人之间友好互助的根本道理：

人之相与也，譬如舟车然，相济达也。己先则援之，彼先则推之。是故人非人不济，马非马不走，土非土不高，水非水不流。

六是自强。《逸周书·大开武》数语显示，不努力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：

若农之服田，务耕而不耨，维草其宅之；既秋而不获，维禽其飧之。人而获饥，云谁哀之。

七是道义。《列子·说符》中一段话，从反面指出了不讲道义的危害性：

人而无义，唯食而已，是鸡狗也；强食靡角，胜者为制，是禽兽也。为鸡狗禽兽也，而欲人之尊己，不可得也。人不尊己，则危辱及之矣。

八是言行。《礼记·表记》一段话，指出了一个人君子所应具备的言行准则：

君子不失足于人，不失色于人，不失口于人。是故君子貌足畏也，色足惮也，言足信也。

九是事理。每种事物皆有其理，《春秋繁露·度制第二十七》指出了其中重要的一种：

天不重与，有角不得有上齿。故已有大者，不得有小者，天数也。
夫已有大者，又兼小者，天不能足之，况人乎？

十是交友。交友涉及原则和做法，《庄子·山木》指出了交友有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两种：

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。
彼无故以合者，则无故以离。

十一是养生。《淮南子·原道》从总体上指出：

夫精神气志者，静而日充者，以壮；躁而日耗者，以老。是故圣人
将养其神，和弱其气，平夷其形，而与道沉浮俯仰。

十二是治家。治家是大题目，《礼记·祭义》讲了其中的孝子之爱：

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
有婉容。孝子如执玉，如奉盈，洞洞属属然，如弗胜，如将失之。严威
俨恪，非所以事亲也，成人之道也。

二、刚柔相济的致治良策

《语选》外编所采录的典籍，与内编基本相同，篇幅则稍长一些。选文从社会的角度采录，凡“身外之事”皆在其中。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，治国平天下与修身齐家紧密相连，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。虽然在文字表述上，没有讲“身内之事”时生动形象，但都千锤百炼，经过历史的筛选，析事力透纸背，说理入木三分，很多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。仍以《伪古文尚

书》为例。《语选》从中选录了四十条，兹列举十条如下：

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，惟修；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惟和。

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。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。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。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

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，不自满假。

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

无稽之言勿听，弗徇之谋勿庸。

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

德日新，万邦惟怀；志自满，九族乃离。

奉先思孝，接下思恭。视远惟明，听德惟聪。

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贵异物贱用物，民乃足。

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；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。

以上文字，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，是非常要紧的。为了长治久安，不可自我放纵，而要以民为本，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。要行善政德政，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。尤其是“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”一段文字不可放过。惩罚不株连子孙，赏赐延及后代，宽宥过失犯罪，惩治故意犯罪，判罪时有疑问者从轻，论功时有疑问者从重。这些都是简约宽厚的统治方式。特别是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一句，体现了古人对生命的珍视。为了不错杀一个好人，宁可使坏人漏网。现代的法治精神，不是与之相通吗？

按照内容，大致可分为十二类。以下每类各选一条，以见古人论政之深邃。

一是律己。统治者只有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己，才能得到下属与民众的归向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谓：

爱人亲反其仁，治人不治反其智，礼人不答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

二是礼义。《礼记·礼运》中一段话，指出了礼义的极端重要性：

治国不以礼，犹无耜而耕也；为礼不本于义，犹耕而弗种也。

三是治体。治体是指治国的体要，《礼记·大传》指出了其中重点：

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所且先者五，民不与焉。一曰治亲，二曰报功，三曰举贤，四曰使能，五曰存爱。五者一得于天下，民无不足、无不赡者；五者一物纆缪，民莫得其死。圣人南面而治天下，必自人道始矣。

四是法治。法治的基本精神是以法治国，关系到一国之安危，《韩非子·有度》对此有深刻认识：

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，则国强；奉法者弱，则国弱。

五是勤政。业精于勤而荒于嬉，政事尤其如此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传》指出：

政如农功，日夜思之。思其始而成其终，朝夕而行之，行无越思，如农之有畔，而过鲜矣。

六是重贤。贤人是国宝，《晏子春秋·谏下》因之将不重贤视做不祥之事：

国有三不祥：有贤而不知，一不祥；知而不用，二不祥；用而不任，三不祥也。

七是顺应。顺应是指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君人南面之术，《吕氏春秋·知度》于此有所论述：

有道之主，因而不为，责而不谄，去想去意，静虚以待。不伐之言，不夺之事，督名审实，官复自司。以不知为道，以奈何为宝。

八是民本。国以民为本的思想，起源甚早，《尚书·皋陶谟》所言尤为简明扼要：

天聪明，自我民聪明；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。

九是智慧。智慧是指对世道的认识和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的方法，《国语·周语上》指出了其中一种：

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

十是交接。交接是指各种人之间的交往和人才的鉴别，《大戴礼记·子张问入官》有一句名言：

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

十一是策略。策略是推行政教的保障，《管子·明法解》中的“威势”就是一种重要的策略：

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，威势也。故威势在下，则主制于臣；威势在上，则臣制于主。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。

十二是用兵。用兵是一门大学问，《商君书·战法》指出了—一个“谨”字：

兵起而程敌，政不若者勿与战，食不若者勿与久。敌众勿为客，敌尽不如击之勿疑。故曰：兵大律在谨。

这些内容中，张舜徽先生对“顺应”（君人南面之术）和“法治”及相关内容尤为重视。他研究周秦诸子，有《周秦道论发微》和《周秦诸子政论类要》二书。所谓道论，张先生认为是道家理论的简称。他从剖析“道”的具体内容出发，说明周秦诸子所讲的“道”，中心内容是人君南面之术。君主一人，才智总是有限的，如果事事躬亲，必不能藏拙，会遭到臣下和群众轻视，甚至导致政权危机。所以人君南面之术的核心是不说话、不做事，而让下属去说去干，也就是《老子》中所讲的“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。诸子政论主要指法家理论。《周秦诸子政论类要》自序中称：“尝博考前史，深服历代大政治家之所施为，以其雄伟之气魄，毅然任天下之重，坚于自信，不以世俗毁其心；刚毅果敢，卓然有以自见于当时而永传于后世。若霍光、诸葛亮、王猛、魏徵、王安石、张居正之俦，治国处事，莫不具有法家精神。观其有胆有识，勇于任事，皆自周秦法家书中取得政治理论以自敦厉者也。然而周秦法家之书，固历代大政治家之所从出也。”总之，一个道论，一个政论，亦即一个君人南面之术，一个富国强兵之术，张先生认为是历代大政治家莫不精熟的理论。因此，他在纂辑语选时，这两方面的内容采录的比例比较大。

法治的内容不必说了，“道论”至今也还是有其价值的。虽然“南面之术”的主体国君已不复存在，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永远会有，“南面之术”的精髓“各负其责”，就值得人们好好珍视。

三、进德修业的国学读本

《语选》内、外编各以十二类概括，实在不足以尽显其深意，再多分几类也未尝不可。再者，古人立言文约意丰，犹如《周易·系辞》所说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”，类别划分殊为不易，也仅仅可供参考而已。故以上介绍，是相当粗略的。

《语选》纂辑时，有少量的重复现象，大致上可分为两种。一种是不同的典籍中，有内容相近的文字，因为精彩，不烦重出。如《荀子·礼论》中有一段讲亲情的话，同前引《礼记·三年问》“凡生天地之间者”一段话差不了多少，不避重复录入，以见古代重亲情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又如《淮南子·主术》一段话，同前引《吕氏春秋·知度》中“以不知为道，以奈何为宝”一段话很相近，也没有割舍。

另一种是同一段文字或不同典籍中相近的文字既见于内编，又见于外编。如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“同声相异而相应，意合则未见相亲”一段话，便是内、外编互见。又如《大戴礼记·礼三本》有段论礼之言，同《荀子·礼论》中“礼有三本”之言几乎一样，也是内、外编互见。这涉及文本的多层解读。变换角度，即有新意。这也提醒我们，身内、身外之事是相通的，修身的道理同样可以用到政事上。

张舜徽先生对这部《语选》的珍视，不亚于他的专著。他在《自序》中说：“纂录既竟，置之案头以备观省。或拈出一言以检束身心，或综合群语以会通理道，悠然有得，益我良多。盖古人立言，不为一时，今人读之，亦有可资借鉴，取古语以为今用者，比比是也。”“如能奉是编为守约之书而常摩挲玩绎之，固进德修业之助矣。”这一段夫人自道，很值得玩味。当前，社会上对“古为今用”的认识已大为深化。人们普遍感到，远古与现代，自然与尘世，有些法则是亘古不变的，优秀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历史上众多的思想家，高扬和谐，高扬进取，高扬人间亲情，高扬伦

理道德,对人类的成长、社会的演进发挥了重大作用。在政治领域,强调民本,强调法治,强调礼义,强调厚生,这些都是几千年中华民族长久昌盛的重要因素。在21世纪之初,我们回过头去清理传统文化,真切地感到文化遗产之丰厚,非其他民族所可及。中华民族要发展,一个重要的前提,就是要继承和弘扬前人优秀的文化传统。对于欲了解传统文化的人来说,《经传诸子语选》便是一部值得推荐的简要读本。

最后,选录一段《语选》自序中的话作为这篇导读的结束语:

后人读古人书,贵在体会其意,而不可拘泥其辞。善学善用,斯为得之耳。

周国林

2006年8月28日于武汉桂子山

自序

载籍极博，非一人之力所能遍读尽记而皆不忘也，亦惟择其精要之语而记诵之耳。于是善学之士，于群书多有节抄之本，而选精录要之业兴焉。余尝病昔之从事选录之业者，有文选，有诗选，独无语选，此亦书林缺典也。古人说理之文，至为繁富，奚由能悉举其辞？苟能择其精义名言选录成书，则治博守约，不啻荟萃群籍于一编矣。大抵唐以前书，说理为多，今所存经传诸子皆是也。率以立意为宗，而精要之言甚简。至于引申发挥之语，连篇累牍而不已。良以发挥不尽，则理有难明，故不惜反复引申而推论之。观其取材之途，不外三例：引用旧言，一也；博征往事，二也；广设譬喻，三也。凡古人早有此言，则必援引以证吾说之有本；或前代遗事有可发明斯理者，必举例以为佐证；仍嫌不足，则又称用日常事物以比喻之。有此三途，而说理之文，斯为繁富矣。经传诸子中文辞畅达而繁富者，无逾《孟子》七篇。观其每说一理，恒举古语、旧事以相证发；又或不尽，则因近取譬以晓喻之。使闻者无辞可驳，翕然推服。轲固长于辞说而善辩论者也，故其说理之文为最胜。推之其他百家之言，莫不如此。倘能汰其引证之繁辞，但取其结论之精语，则其义固简约而易守也。则语选之编，为不可缓矣。

自韩昌黎《进学解》提出所谓“纪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”之读书法，于宋代学者治学之方，启发极大。如黄震从历代史中摘抄而成《古今纪要》，即记事者必提其要之意也；洪迈于群书皆有节本，从群经诸子以至前汉，题为《法语》；从后汉至唐，题为《精语》；即纂言者必钩其玄之意也。然而此一方法，实开自汉人，不自昌黎始也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道家有《道家言》二篇，法家有《法家言》二篇，杂家有《杂家言》一篇，小说家有《百家》百三十九卷，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抄群言之作也。可知

摘录精语以成一书，由来旧矣。《文心雕龙·诸子篇》亦言：“洽闻之士，宜撮纲要，览华而食实，弃邪而采正。”证之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艺文志》，梁庾仲容、沈约皆有《子抄》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有司马温公《徽言》，乃温公读诸子书时手抄成册者也。

如汉、隋史志所录诸家撮抄群言之书，虽不标语选之名，而实为语选之体，知先贤已早为之于前矣。顾其书皆不传于后世，论者惜之。余治学好勤动笔，早岁读周秦诸子，尝撮录善言，别抄成帙。后又推广至于六艺经传，经传初无局限。有见之《十三经》，而弃置不录者，如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是也；有不见于《十三经》而采录及之者，如《逸周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大戴礼记》是也。诸子之书，下迄于隋。唐以后新出虽广，然言多枝叶，与立言殊科矣。古人立言垂世，不外修己、治人二者。修己，身内之事也；治人，身外之事也。致力于身内者，则尚志、敦品、笃学、立事皆属焉；致力于身外者，则治国、安民、建功、成业皆属焉。选录时分为内编、外编以区处之，所以别其效用，俾不混杂耳。纂录既竟，置之案头以备观省。或拈出一言以检束身心，或综合群语以会通理道，悠然有得，益我良多。盖古人立言，不为一时，今人读之，亦有可资借鉴，取古语以为今用者，比比是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。”如能奉是编为守约之书而常摩挲玩绎之，固进德修业之助矣。顾以后人读古人书，贵在体会其意，而不可拘泥其辞。善学善用，斯为得之耳。晚年衰頹日甚，犹强起写定是书，亦欲用此为温故之简本，聊以自课云尔。

张舜徽